

杭州城市雕塑的 历史源流 与发展概述



杭州的城市雕塑发展的历程基本集中在近10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20世纪以前、民国与抗战时期、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步入21世纪后5个主要的历史阶段。

旧时的杭州，至少到19世纪末，在城区几乎没有符合现代城市雕塑定义的作品。但是，杭州西湖群山上的石窟造像可算得上是雕塑的精品。

在20年前的杭州，如果你想知道城市中有些什么样的雕塑，在什么位置，大多数杭州人会马上给你一个答案。而现在，几天没去散步的你，可能就会惊讶地发现周围的环境中突然多出来一件城市雕塑作品。

漫步杭城，在喧嚣的闹市中、秀美的景区里以及恬静的社区周围，你常常会 and 雕塑不期而遇。杭州的城市雕塑在短短的几年里得到了快速发展，它们从公共空间的标示物与象征意义入手，迅速地以贴近生活的题材与方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行走在城市空间中的人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与城市雕塑相遇。那种屈指可数、人人尽知的城市雕塑的时代，伴随着杭州城市文化建设的发展而快速成为历史。

城市雕塑这个概念是由刘开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是中国特有的、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在国外一般叫户外雕塑，是与室内雕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但户外雕塑不能代替中国的城市雕塑概念，它所指的范畴比城雕的概念要大很多。我们常说的城市雕塑概念主要指设立在室外的、城市公共环境中的雕塑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特性：强调城市雕塑与城市广场、街区、楼房、绿化等各种因素相协调的特性；具有主题性的纪念与装饰作用、能达成美化城市作用的特性。从作用上讲，它通常可分为纪念目的、主题性宣扬目的、装饰目的等几个大的类别。

在杭州，城市雕塑发展的历程基本集中在近10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5个主要历史阶段：20世纪以前、民国与抗战时期、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步入21世纪后。



龙兴寺经幢（唐）



慧云岭石窟造像



宝成寺石窟造像

20世纪以前杭州的城市雕塑

旧时的杭州，至少到19世纪末，在城区几乎没有符合现代城市雕塑定义的作品。除了建筑上的雕梁画栋，能叫雕塑的大概就只有大石头狮子和庙里的菩萨了。

中国的造像，流传下来的主要以宗教、陵园雕塑为主。而杭州，则基本都是宗教造像雕塑。杭州宗教造像开始于唐代，现存最早的寺院雕塑是唐开成二年（837）兴建的龙兴寺经幢上的浮雕（现存于灯芯巷、延安路口）。五代以后，受吴越国国王推崇佛教思想的影响，在环西湖周围的山上，陆续开凿了大量的佛教石窟。

根据《佛教年表》记载，杭州最早的石窟造像始于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烟霞洞佛教石窟的开凿。7年后，开始开凿飞来峰石窟。我们最为熟悉的飞来峰大肚弥勒佛像则是雕刻于宋乾德四



飞来峰石窟造像（郑从礼摄）



飞来峰大肚弥勒像（郑从礼摄）



年(966)。

整个杭州的佛教石窟造像运动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五代开始,到元代结束,断断续续雕凿了近400年时间,其间出现了五代、宋、元等几个造像高峰时期。这些佛教石窟大多集中在西湖的四周,因此也被称为“西湖石窟”。目前,杭城现存的造像群约有19处,其中造像最多、最著名的是灵隐景区的飞来峰造像群。其他主要分布在这几个地方:慈云岭造像(将台山和玉皇山之间的慈云岭南坡)、石屋洞造像(满觉陇路)、烟霞洞造像(满觉陇路,翁家山麓)、仁王讲寺造像(紫阳山南麓白马庙巷)、宝成寺造像(紫阳山东麓)、圣果寺造像(凤凰



通玄观石窟造像（局部）



仁王讲寺石窟造像（局部）

山南麓）、天龙寺造像（慈云岭西南侧天龙寺后的山岩上）、通玄观造像（道教造像，位于紫阳山东麓，太庙巷紫阳小学后的崖壁上）等。其中天龙寺造像与慈云岭造像、烟霞洞造像合并起来又有西湖南山造像的称谓。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近年来在余杭区瓶窑镇西南，有一座叫南山的小石山，其山腰间分布着30余尊元代的摩崖造像（现存12尊），这个造像的名称也叫南山造像，但却并不属于西湖南山造像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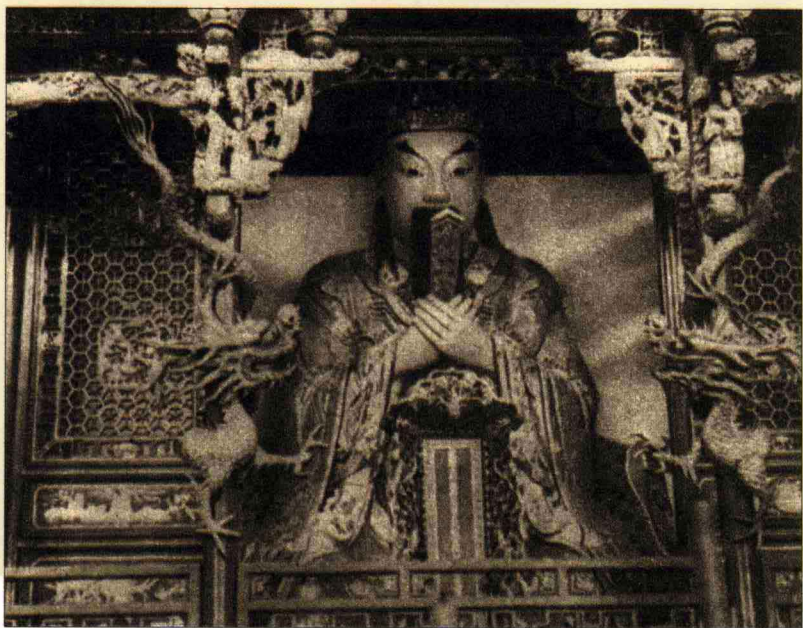
杭州的石窟造像中，有一处特别的地方，就是烟霞洞中的十六罗汉雕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雕像。它们被雕刻在烟霞洞内左右的壁面上，造像线条简洁明快，形象生动，具有鲜明的神态特征。这组雕像相传为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钱弘俶的母舅吴延爽出资建造。在晚唐至五代期间，讲罗汉都是讲十六罗汉的。因为佛经中，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遵照佛的嘱托，不入涅槃，常住人间，普度众生。而后世所谓的十八罗汉据说是为了符合中国古代对数字上面吉祥含义的追求，增加了降龙罗汉、伏虎罗汉。据记载，烟霞洞内原有的造像数量很多，但基本都被毁于20世纪60年代。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六罗汉造像是1978年根据历史照片进行修补与重塑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

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没有塑造写实人物雕像的习惯。虽然在建筑上可以有极尽奢华的雕梁画栋，但提到人物塑像，却似乎只有神明可以被塑像，而石人、石马则永远都是陵园的装饰物。西方的城市雕塑最早起源于纪念的需要，他们用雕塑来纪念曾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和事，并用以弘扬某种值得尊崇的精神。而在中国，相应的目的被另外一种物品所替代——牌坊。牌坊是一种抽象的纪念物，基于精神上的鼓舞与尊崇。牌坊的样式被严格地规定与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一枚放大的勋章，样式上的森严等级表明了它应被尊崇的程度。而具体的事件则是通过题记与传说来表述。在这些牌坊上，被赋予了皇帝的嘉奖、世人的尊崇、道义的弘扬等含义。不知是由于一种怎样的忌讳，皇族、名人的留世形象都是以画像的形式来记录，绝少有人塑像的。算来算去，也只有像关公这类被当做保护神一样的人物，才有被塑像的可能。但这也只是出于敬拜的需要，至于塑像是否和本人相似，则并不重要，



烟霞洞罗汉像（局部）



原岳王庙岳飞塑像

也无从考证。塑造时形象的来源，更多还是依据精神上的意会来达成。

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杭州能算得上城市雕塑的，可能只有西湖边的岳庙与里面的跪像。这是一个纪念的场所，坟前的跪像和墓地的环境一起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纪念性环境。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我们在祭拜民族英雄的同时，通过对奸佞者跪像的唾弃，引发出我们心底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一精神活动的实现正好符合了现代纪念性城市雕塑的功能要求，所以我们讲它具有现代城市雕塑的特征。而实际上，这里从宋代开始，就一直发挥着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岳庙有史可查的跪像铸造于明代，最早只有3个。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都指挥使李隆在杭州岳坟前铸秦桧、王氏、万俟卨3人反绑跪像。因民众憎恨奸臣秦桧，跪像很快被砸得破



原岳王墓前的石俑

损不堪，铸铜都被损坏，可见民众的心情。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浙江按察副使范涑认为铸铜质地不够坚硬，改用铁重铸秦桧、王氏、万俟卨3像，并增铸张俊像，成为4跪像。但即便是用铁来铸造跪像，也没能在民众的怒火中保持多少时间。后来在清代雍正九年（1731）、乾隆十二年（1747）、嘉庆七年（1802）、同治四年（1865）、光绪二十三年（1897）先后5次重铸跪像，可谓是屡毁屡铸。我们现在看到的岳庙铁跪像是在1979年根据河南汤阴岳飞庙的跪像形象重新铸造的。



原岳王庙岳飞父母像



岳坟前铁跪像



邓石如立像（老照片）

民国与抗战时期杭州的城市雕塑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一批批莘莘学子从国外学成归来，西方文化开始与中国社会相交融。在美术方面，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开始教授西洋美术技法课程；在雕塑领域，开始出现名人造像。1921年，西泠印社落成了丁敬、邓石如和吴昌硕3人的塑像，分别为中国工匠和日本朝仓文夫所造。这是杭州写实人物雕塑的开始，也是杭州现代城市雕塑的开端。它们的出现还意味着长久以来中国人对雕塑造像思想的变革，人们开始逐渐接受新兴的城市雕塑理念。1928年5月，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建立了雕塑系，开始培养西洋雕塑人才。

民国时期中国旅行社编《杭州导游》中有这样的记载：“杭州西湖孤山旁有秋瑾墓、浙江先烈祠、阵亡将士墓，湖滨公园内有北伐阵亡将士纪念



丁敬坐像



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34年）



碑座上的浮雕之一《抵抗》



陈英士烈士纪念塔（192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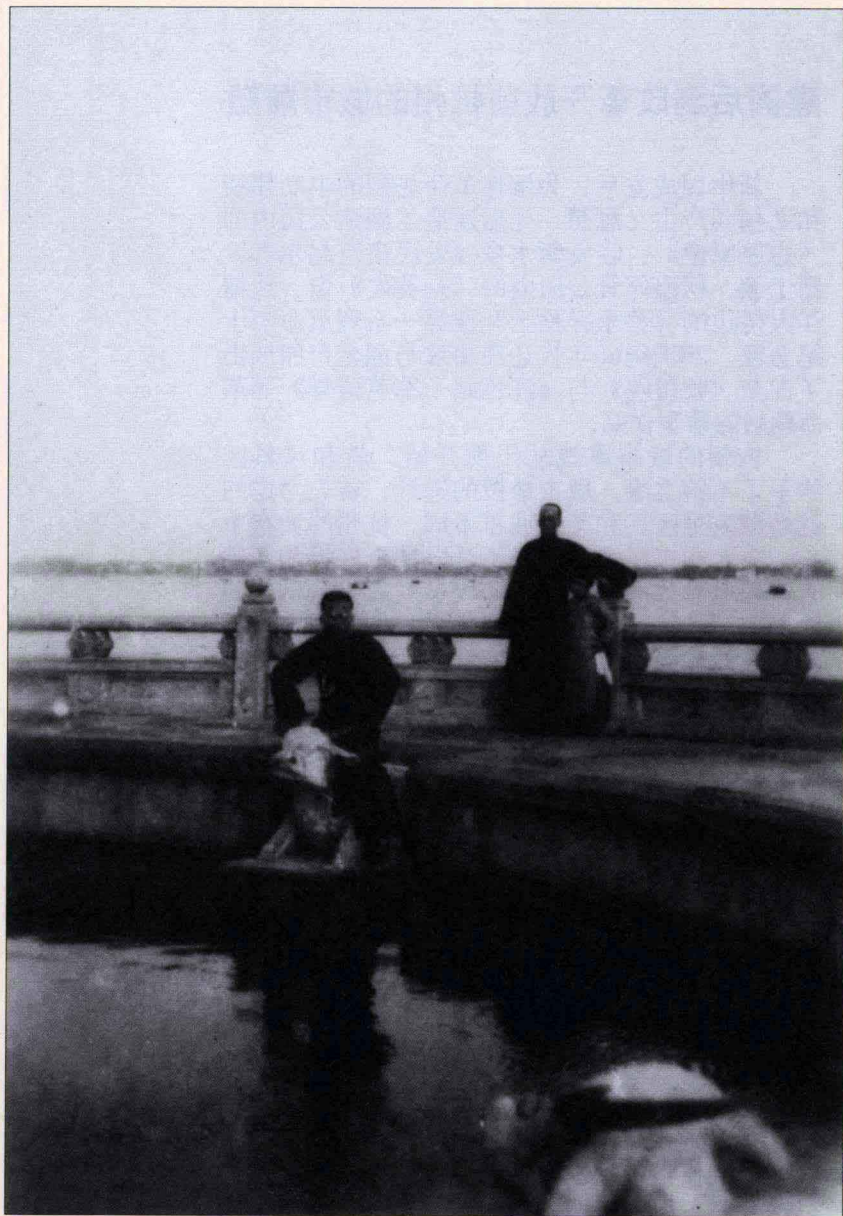
塔和陈英士铜像。”（中国旅行社1947年版，第21—22页。）《陈英士烈士纪念塔》建于1929年，位置在现今的湖滨三公园处，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雕塑家创作的现代写实人物纪念雕塑。《北伐胜利纪念塔》也建于1929年，位于湖滨一公园内。5年后，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湖滨六公园建立了另一个纪念性城市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这也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这3座纪念塔均在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



北伐胜利纪念塔 (1929年)



首届西湖博览会纪念塔 (1929年)



西湖博览会纪念塔内池的水牛雕塑